

熱點聚焦

## 後疫情時代下日中經濟關係之變化

### Changes in Jap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VID Era

盧信吉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argu@nchu.edu.tw

#### 壹、重建裂解的全球化連結

千禧年前後迎來的經濟全球化結果，不只建構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模式，同時也讓所有行為者從細緻的專業分工獲得了更有效益的成果。於此同時，中國透過便宜人力、豐富資源以及廣大市場的條件獲得重建世界地位的優勢，並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可忽視，對任何國家而言，如何建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都屬於優先選項。

然而 2019 年突發的疫病，讓世界被迫「關閉」。其影響範疇除了讓個別國家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針對特殊狀況做出特殊應對之外，更多的是無差別式的關閉國界用以保護「單一國家的安全」。因此，全球化的過程形同被迫中斷一般，暫時無法如同過往的互通有無，或許寄居在貨品上的病毒無法核酸檢測，但其中關鍵的要素一

人終究難以倖免。對於後疫情時代而言，最為重要的不僅限於科學發現，而是在這其中如何避免將「人」這樣關鍵要素豁免於病毒傳染之中，將成為新時代下政策能否遂行的基本判斷。

全球化模式下的貿易需求仍然存在，只是在考量難以管控的情況下，施以有限度的互動。對於後疫情時代下的全球而言，科學證據暫時還是唯一的解方，只有透過更容易辨識的疫苗施打系統，或者是健康條碼才能說明單一個體的健康安全，茲以證明這樣的互動標準符合健康標準。對於以全球為活動範疇的生產、貿易系統更需要這樣的外部協助，如何增加符合這樣基本需求的識別系統，則成為當前經濟活動的基本配備。

2022 年日本對中國出口量超越對美國出口量，說明了對於日本而言，中國顯然是其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

然而，從具有條件限制的入境觀光而言，中日之間更有默契的是採用經濟條件較高的簽證條件，藉以篩選能夠影響兩國現有經濟關係的特殊人群。這些經濟條件較佳的人民代表進行的全球化經貿關係，更能說明在疫情影響後的經濟發展，顯然有著與過往不同的條件。

## 貳、經濟政策的新意象

同一時間，日本政府於 2022 年年底依據《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將半導體、蓄電池、重要礦物、醫療相關藥品、部分特殊天然資源，以及機器人產業、飛機、船舶零組件、雲端系統與磁石物資等 11 個領域納入穩定供應的「特定重要物資」，以符合同年 5 月通過法案中，對於強化戰略物資供應鏈、確保核心基礎設施安全、尖端技術的官民研究與專利不予公開等戰略目標的落實。顯示了日本

政府對於當前經濟貿易互動上的限制，與過往經貿政策目標上的調整，這些調整雖然與疫病之間並無直接關聯，但近乎同一時間的調整顯示，日本當局對於兩者危害日本國家安全的認知並無二致。

在考量經濟與安保議題的結合上，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政策是否有利於日本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將成為更有依據的政策目標。例如，是否仍然極度需要全球化模式的經濟關係，或有更加值得探討的地方；更甚者，在於廣泛地將影響當前社會運作的產業鏈納入經濟安全保障的範圍，是否說明了在脫離全球化進程的規劃中，日本更加積極地施加壓力。

對此，中國同樣透過更為精細的政策操作，加以回應。

檢視「20大」的中國外交政策的展望，主要聚焦第14條，其中包含「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於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否取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等基本認知上的再度肯定。以及「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夥伴關係，致力於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外交政策具體作為，與「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符合過去全球化時代的美好藍圖等，不同階段、有目標性的論述，闡述著與中國體系連結的穩定與可預期的經濟目標。

符合經濟政策中最为現實的一個面向，也是經濟政策能夠說服人民中很重要的基礎。

日中兩國對於經濟政策的闡述正在產生質量上的變化，雖然不見得在論述中直接對話，也不見得會有很具體的衝突點，但顯然兩國在說明人民如何實踐經濟政策上有著完全不同的方向。這也將影響未來兩國經濟關係的轉變。

### 參、從解封經濟到國家關係

當前國際社會處於後疫情時代下解封條件的逐步摸索階段，同時面臨俄烏戰爭劇變下美中持續爭霸的進階階段。國家需要及時的回應國際現勢的戰略需求，避免人民難以回應全球快速變化的局勢；同時，國家也需要制定出一套，符合短、中、長期戰略目標的政策，在相互不排斥的前提下，逐步落實未來的發展目標。

日本在外交與軍事層面上選擇接近美國的戰略目標與作為，卻又必須維繫與中國互動的經濟生存空間，將使得未來日本在與中國進行互動的同時，陷入了難以同時滿足兩方需求的困境。在戰略的選項上看似以「國家安全」為優先的保障目標，但實際上則是需要面臨中國因素的考驗。

對於中國而言，其在乎的並非西方國家內所強調的「民主」、「人權」或者國家治理的「正當性」。

反過來說，在國家成為國際關係中獨立且具有主權的單一行為者之後，其不受到其他國家干涉的「國家安全」要素成為中國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核心要素具體呈現在中國對外關係之中。例如當前日中關係下，中國也知曉其借重的是中國高端消費能力對於振興日本觀光產業的幫助，只是從單一政策下必須要思考的是，或許中國

更應該大舉開放國外觀光，讓中國人民具備的經濟能力不遺餘力地拓展至他國市場內，進而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力。

然而，中國意有所指地透過限制少數族群的內規，將對日觀光政策影響力限縮到一定程度，說明的是中國對於政策制定的「主動性」。更可以期待的是，在日中外交關係一旦好轉的情況下，中國宣布大舉開放的經濟互惠政策。這樣的考量方向，是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也是單純考量科學證據的同時，所意想不到的結果。

從解封到國家關係的互動上，或者從全球化連結的裂解到重建過程中，日中經濟關係的改變與具體作為有許多細節上的差異。對於日中兩國而言，更多的是價值選擇上的不同。不論解封經濟關注的是觀光產業，或者重建交通運輸業，乃至於產品供應鏈上的恢復，對於建構當前國際社會的樣態都有著關鍵的影響。相同地，其國家發展目標的設定，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發動戰爭、類戰爭、特別軍事行動等作為，也能同時改變地緣、地貌，皆可同時改變兩國的經濟關係。

#### 肆、結論

對於近代西方國家行為者而言，大致上有著一個相同的發展脈絡可循，透過民主風氣選出領導階層、基於完備的官僚體制建構主要政策、運用公開的邏輯辯證選擇國家、政策的發展目標，進而形塑國家對於未來方向的共識，對外關係則以和平的模式與他國互動，經濟關係則以共享概念分食既有成果。從當前日中經濟關係的變化，可以檢視當前中西方國家的概念與解讀社會方式的差異。從民主到權力集中乃至於落實於黨國體系，從多數共識到菁英領導下的決策模式，從和平發展到不惜一戰的政策底線，都說明兩者間對

於任一時間點、概念上的不同。

後疫情時代所代表的是科學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從單一面向演變到更多政策的落實，也是核酸檢測與病毒的戰爭暫時落下帷幕的單向證據，更多的是國家行為者在面臨這樣變化的同時，如何推陳出新地建構一個更符合本體預期的結果，諸如透過經濟政策維繫國家安全的經濟安保體制不啻為是。